

J I A N G X I N O R M A L U N I V E R S I T Y

自我的现代觅求

——卢梭《忏悔录》与中国现代自传（1919—1937）

A MODERN QUEST OF SELF

ROUSSEAU'S *CONFESSIONS* AND MODERN
CHINESE AUTOBIOGRAPHY (1919—1937)

梁庆标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J I A N G X I N O R M A L U N I V E R S I T Y

自我的现代觅求

——卢梭《忏悔录》与中国现代自传（1919-1937）

A MODERN QUEST OF SELF

ROUSSEAU'S *CONFESSIONS* AND MODERN
CHINESE AUTOBIOGRAPHY (1919-1937)

梁庆标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自我的现代觅求——卢梭《忏悔录》与中国现代自传(1919—1937) /
梁庆标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12
ISBN 978 - 7 - 5161 - 5321 - 5

I. ①自… II. ①梁… III. ①《忏悔录》-影响-中国文学-
现代文学-自传体小说-1919—1937 IV. ①I565.074②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312287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宫京蕾
特约编辑 大 乔
责任校对 周 昊
责任印制 何 艳

出 版 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8
插 页 2
字 数 268 千字
定 价 5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美国传记理论家坎道尔（Paul Murray Kendall）在其名著《传记艺术》中说，那些优秀的传记作品能够“从冰冷的故纸堆中引发出温暖和鲜活的生命”。其实，评论家对传记作品，特别是对自传作品的解读和评论，同样可以产生这样的效果，他们剥离表象、深入底蕴的剖析，旁征博引、独具慧眼的解读，同样可以让读者重新感受到已逝生命的“温暖和鲜活”。

读庆标的这部《自我的现代觅求》就有这样的感受：我们如同在观看新文化运动兴起后 20 年间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一幅群体画像，特别是其中的郁达夫、巴金、郭沫若、吴宓，他们的音容笑貌重新出现在我们面前，举手投足有声有色。庆标从中国自传第一个黄金期里出现的近百位作家中选择出这四位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他们都是新旧交替时期的知识分子，身上充满矛盾，反映了那个时代固有的特点；他们又各具个性，有自己独有的价值选择和人生道路。在庆标的笔下，我们看到郁达夫集“零余者”和反抗者于一身，他具有文人传统的家国情怀，也要求西方式的个性解放，但又自卑、困惑、颓丧，始终处于自我分裂的状态；巴金以“讲真话”为旗帜，显示出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以对社会和家庭黑暗的揭露体现责任感和启蒙精神，不过他的“讲真话”和“忏悔”又是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反映了他的软弱和妥协；郭沫若自传的内容、思想和风格在不断变化，这是由于他身份的变化：从启蒙者成为革命家，再成为政客，其中虽也显示

出矛盾和分裂的痛苦，但都被他善变的性格所调和；吴宓本性保守而又具有浪漫气质，他以道德家自命，就不得不压抑强烈的性苦闷，他有知识分子救国济民的人生目标，并且努力维护自己的形象，其实迂腐而脱离实际，不时陷于尴尬和窘境。对这四位传主的分析是本书中最成功、也最有趣的部分，庆标为人沉静多思，对文本的细读常有独到的发现，显示出他的文学悟性。

庆标对理论也有强烈的兴趣，近二三十年西方出现的一批自传研究的论著，他都认真收集和研读，这使他具有开阔的眼界，可以运用新的研究方法。他选择了一个视角：卢梭的《忏悔录》同1919—1937年中国自传的关系，其中又以同卢梭关系最为密切的几位作家为重点，以他们文本中的“身份”为考察的中心。这是一个极佳的切入点，因为卢梭是西方现代自传的奠基者和重要代表，他的《忏悔录》是介绍到中国最早，也是对中国现代自传产生重大影响的作品。庆标发现，这几位作家虽然都熟悉卢梭和他的《忏悔录》并受其影响，但是他们生活的时代、环境和文化传承同卢梭又有重大的差异，他们同卢梭的关系具有复杂性：郁达夫赞颂卢梭但只能片面地效仿；巴金对卢梭怀有终身的崇拜但难以克服其间的差异；郭沫若出于自己身份的变化对卢梭从推崇、模仿到否定；吴宓对卢梭表面道德化的批判而行为、气质又颇有相似。独特的视角和“身份”概念的应用使庆标避免了传记史研究中的俗套，为刚刚兴起的中国比较传记研究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范例。

庆标从事自传和传记研究迄今已八年，他始终目标如一，专心致志、无所旁骛。这部著作是他辛勤劳作的成果。中国的传记已经进入新的黄金期，传记研究的潮流已经启动，庆标是其中出色的一位，我相信他一定可以在此研究领域做出更大的贡献。

杨正润

2013年12月于黄浦江畔

目 录

引言	(1)
第一章 自传研究的理论视角	(6)
第一节 自传与自我意识	(9)
第二节 自传与身份认同	(17)
第三节 作为“微观政治”的自传	(25)
第二章 中国现代自传发展述要 (1919—1937)	(33)
第一节 中国现代自传的背景考察	(34)
第二节 现代自传的风貌	(43)
第三节 现代自传的特质	(51)
第三章 研究综述	(57)
第一节 域外视野	(57)
第二节 国内研究	(67)
第四章 《忏悔录》在现代中国的译介与接受	(75)
第一节 《忏悔录》的译介与接受 (1907—1928)	(77)
第二节 《忏悔录》的译介与接受 (1928—1937)	(91)
第五章 《忏悔录》及其影响下的现代自传	(110)
第一节 《忏悔录》的自传意义	(110)
第二节 《忏悔录》影响概说	(132)

第六章 自我剖析与个性张扬：郁达夫自传	(149)
第一节 “中国的卢骚”	(149)
第二节 “零余者”郁达夫	(156)
第三节 “自我/国民”的纠葛	(166)
第七章 “真实”与“忏悔”的限度：巴金自传	(173)
第一节 以卢梭为师	(173)
第二节 回到“青年时代”的巴金	(177)
第三节 自我的“埋葬”与“流放”	(187)
第八章 变幻中的“球形”人格：郭沫若自传	(198)
第一节 卢梭“万岁”	(198)
第二节 “文学=革命”	(202)
第三节 “忏悔”之路与“球形”蜕变	(208)
第九章 “反卢梭”的困境：吴宓自传	(222)
第一节 以卢梭为“标靶”	(222)
第二节 “道德家/浪漫诗人”吴宓	(225)
第三节 “自缚/自搏”的困境	(237)
结语	(247)
附录 中国现代自传主要书目	(260)
主要参考文献	(266)
后记	(278)

引言

2013年第6期《炎黄春秋》杂志刊发了一则“郑重道歉”启事，此事迅速传播，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引发了某些人的效仿^①。8月20日，北京八中老三届同学会陈小鲁会长（陈毅之子）的“公开道歉信”也在网上广为流传。还有人征集了30多人的忏悔文章，正准备出版《我们忏悔》文集，试图推进国人的集体忏悔。这些道歉者、忏悔者都曾是“红卫兵”，在“文革”期间对他人造成了伤害，为此心怀愧疚，难以平复，经过长久的天人交战，终于在年老之际表达了公开的“忏悔”。其“忏悔话语”虽然比较简略，但态度诚恳，也确实触及了敏感且普遍的问题，传达了积极的信息，如陈小鲁在信中如此说道：“我的正式道歉太迟了，但是为了灵魂的净化，为了社会的进步，为了民族的未来，必须做这样道歉，没有反思，谈何进步！”可以肯定，在此影响下，此类忏悔还会更多、更深入。客观地说，这种现象在当代中国并不多见，因为他们的忏悔自白并非由于个人私利或外在压力而发，而是源自自我的内在需要，而且也遇到了来自各个方面（官方的、亲人的等）的障碍与阻力，如《我们忏悔》的出版就困难重重，因此更显得难能可贵。但是考察中国现代思想史和自传史，可以发现这种现象其实并不鲜见，甚至还一度形成风潮，

^① 如《南方周末》6月20日刊登了《我也来道个歉》，《快乐老人报》6月27日发表了《这句对不起压在心头40多年》，《新京报》8月7日发表了《男子忏悔：“文革”期间母亲因被我举报“反革命”遭枪决》。此外，据资料显示，还有一些未曾公开的道歉信。

是现代知识分子自传中的流行话语。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代“红卫兵”的道歉可以看作五四时代知识分子“忏悔人格”的回响,是一度断裂并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逐渐复苏的传统的延续,是追求具有独立人格的现代自我的持续努力。为了更清晰地理解当代自传书写的特性、价值及不可避免的缺陷,返归现代自传的场域,对其产生背景、影响因素和表现特征进行考察,或许是不无裨益的。

中国自传虽有悠久的传统,但缺乏佳作,发展缓慢,进入20世纪20、30年代,在复杂的社会、文化语境下,中国自传才出现了许多新的特征,也呈现出复杂多元的风貌,进入了自传写作的“黄金时代”和“现代”时期。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不可否认,西方自传的传播和影响在其中起了直接和重大的作用,而法国自传家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忏悔录》^①则被公认为产生了最大影响的经典自传:“卢梭《忏悔录》是介绍到中国最早、影响也最大的西方传记作品,它对中国的个性解放和思想解放运动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并且在20世纪20—40年代和80年代引起了“卢梭热和自传热”^②。鉴于这部经典自传与中国现代自传如此密切的关系,本书将聚焦这一现象,试图从影响研究的角度进行深入考察,分析《忏悔录》在现代中国大陆(1919—1937)^③的译介、传播,以及中国现代自传者对它的选择和接受情况,从一个侧面对中国现代自传的进程以及国民心理进行审视,同时也借此窥测这一时期中外文学关系的一般状况。

毋庸置疑,对中国现代自传的发展而言,歌德的《诗与真》、富兰克林的《富兰克林自传》、托尔斯泰的《忏悔录》等自传经典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之所以选择《忏悔录》作为分析的对象,则基于

① 下文提及《忏悔录》,如无特别说明,皆指卢梭的《忏悔录》。

② 杨正润:《传记文学史纲》,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297页。

③ 本书主要考察1919—1937年的中国现代自传与《忏悔录》的关系,基本是以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从五四运动到抗日战争爆发)以及自传的发展特征为依据,因为在中国,尤其是现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与历史、社会的变迁有着极其密切的关联,这是考察文学现象时必然考虑的重要因素,当然在具体操作中也并不仅仅局限于这一时段,因为文学本身同时也具有很强的延续性,无法同传统截然分割。

更多具体的因素。首先,《忏悔录》承前启后且独树一帜,是现代自传的滥觞和代表,这一点已为研究者和读者所公认^①;其次,它提出并包含了诸多关于自传的根本性问题,同时也触及了人性的基本层面,如真诚、虚假、忏悔、辩解、身份、自我意识等。通过自传中的自我剖析、解释与诉求,卢梭也成为以个性自由、独立为特征的现代自我的典型;再次,如前所述,它一般被认为在中国现代自传者中接受最广、影响最深,且已为学术界普遍承认,因此极具研究价值。而目前国内外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状况不容乐观,这也是激发本书写作的一个促动因素。虽然已经有部分研究者涉足《忏悔录》与中国现代自传的关系这一论题,试图从宏观或微观的角度进行论证、分析,不过,切实的、整体性的实证研究依然缺乏,大多研究还是陷于臆测或平行的对照。这必然给人留下一些疑惑:《忏悔录》在现代中国的译介是否丰富,接受者的接受心理或对它的认识与评价如何,对它的认同或抗拒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就目前情况来看,这一问题依然值得认真探究。

法国比较文学学者基亚曾经对影响研究提出了批评,认为“有关影响的问题的研究往往是令人失望的”。^②不过应该看到,他针对的主要是总体性的、片面性的影响研究,因为每个作家、每个民族的文学往往是非常复杂的,这种笼统的分析往往会掩盖许多复杂的事实和真相,将文学关系简单化。因此,对接受者的接受语境、接受方式和心理的具体分析尤为重要。为了尊重事实,实证的方法、对话的态度必不可少,一切假设、怀疑、争辩,都意在抽丝剥茧中接近真相。由此本书从对这一现象的认识开始,带着上述疑惑进行考古式的发掘,试图从影响、接受研究的角度切入这一论题,在译介和实证梳理的基础上,以自传理论为指引,重点考察中国现代自传者对《忏悔录》的

① 当然,随着自传研究的深入,一些研究者试图发掘更多的早期自传,尤其是可以与《忏悔录》相媲美的自传作品,以改变《忏悔录》独自尊大的局面,但迄今为止尚未对《忏悔录》的世界地位构成威胁。

② [法]基亚:《人们所看到的外国》,载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4页。

接受情况以及由此呈现的与卢梭的异同。

一般而言，自传是个体的人实现自我认识、自我表达、自我纪念的重要方式，是自我主体性的体现。但由于受到传统文化因素的影响，中国传统自传在篇幅、描绘方式、个性表现等方面都难以与西方自传相比。对一般读者来说，卢梭对现代人自我认识的重要意义，主要在于通过《忏悔录》，他成了现代自我的先驱和典型。他以“日内瓦公民”身份自居，真诚、独立、平等、自由是其基本特征。具体表现在《忏悔录》中，就是大胆的自我暴露、深刻的自我剖析、真诚的忏悔意识，以及强烈的个体反抗精神。同时，作为现代自传的典范，《忏悔录》在叙述方式、文学风格等方面都有很大的突破，不可避免地在全世界的自传写作和人们的自我认识产生影响。在《忏悔录》影响下的世界图景中，现代中国就是一个重要板块。在20年代前后，《忏悔录》在中国的译介一度出现高潮，多个译本（张竞生、章独、汪炳琨译本）不断再版，还出现了多部（篇）评介著述，留学生对它的直接阅读也非常普遍。译介者、研究者对卢梭其人的评价和理解，除了少数情况（如吴宓、梁实秋等）基本上都比较一致，侧重其正面的形象与价值。这种境况也促成了它被广泛接受的局面，如鲁迅、郁达夫、田汉、郭沫若、欧阳予倩、吴宓、巴金、苏雪林、谢冰莹、朱湘、章衣萍、冯至、蒲风等人，这正与30年代现代自传的兴盛相应和。

整体而言，《忏悔录》与中国现代自传的关系体现在诸多方面，并且产生了不同层面的反响。其中既有对它的积极接受和认同，又有内在的抗拒和鲜明的批判，体现了中西文化在“原罪”与“性善”、“忏悔”与“自省”方面的差异，也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受“修齐治平”思想根深蒂固的影响。郁达夫、巴金、郭沫若、吴宓这四位自传者既是独特的个案，又具有鲜明的代表性。除了共有的自我披露的勇气和“忏悔话语”外，郁达夫在自传中展露出大胆的自我剖析、自我反省及个性追求意识，是“五四”个性主义精神的表征，与卢梭精神最为接近；巴金则奉卢梭为老师，以“讲真话”为圭臬，高扬知识分子的社会批判意识，是社会责任感与启蒙精神的体现，不过这也导致

他对“个体之我”的认识与表达的局限；就郭沫若而言，其自传思想、风格的不断变化就是他与卢梭关系变迁的证据，更是他身份、人格变易性的折射，反映出中国知识分子在社会、政治面前自我定位、个体选择的困境与矛盾；与他们相比，吴宓的独特性在于他的“反卢梭”立场，他是那些努力从道德角度批判卢梭的“文化保守者”的代表，而吴宓的内在矛盾性也暴露出在道德观念拘束下自我认识与定位的尴尬处境。

与《忏悔录》相对照可以看出，中国现代自传更多地体现了差异性要素，如叙事描写上的传统性、结构上的松散性、“忏悔”意识的淡薄、个体与社会和国家的纠葛、自由独立精神的匮乏、哲学思辨意识薄弱等，这与传统文化思维的影响以及中国现代的政治社会局势密切相关。对于这种差异，我们既要持“理解的同情”的姿态，避免以“后见之明”的优势进行不当的批评，又要正视缺陷，从客观、高远的角度进行审视剖析，希图最终有所改善。为此，本书以当代西方自传理论与批评视角为参照，以《忏悔录》为镜像，力图对这一现象进行细致而深入的考察。

第一章

自传研究的理论视角

自传 (autobiography) 看似简单, 其实远非如此。奥内 (James Olney) 指出, 一般而言, “自传是最简单也是最普通的文学事业”。每个人都可以写作自传, 但同时它又被看作 “一种极为大胆的、甚至是有勇无谋的事业——是进入了连天使可能都非常害怕踏入的领域的一种冒失的冲动”。^① 其根本原因就是它直接触及了人的存在的根本问题: 自传写作和研究都是对 “人” 这一 “斯芬克斯之谜” 进行的探索, 是对 “认识你自己” 这一古老命题的回答。而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个体, “自传本质上就是一种个体的和具有特性的艺术”^②, 其答案自然也就各有不同。

在西方, 大致自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 自传研究逐渐吸引了学者们的目光, 如著名的研究者居斯塔夫^③ (Georges Gusdorf), 而到了 70 年代之后, 则出现了自传研究的兴盛局面, 斯宾格曼 (William C. Spengemann) 指出, 在他写作《自传的形式》一书的 70 年代, 自传

① James Olney, “Autobiography and the Cultural Moment: A Thematic, Historical, and Bibliographical Introduction”, in James Olney ed., *Autobiography: Essays Theoretical and Critical*,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3.

② Thomas Couser, “Of Time and Identity: Walt Whitman and Gertrude Stein as Autobiographers”, *Texas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Language*, Vol. 17, No. 4, 1976, p. 787.

③ 他那篇自传研究的奠基之作《自传的条件与局限》(*Conditions and Limits of Autobiography*) 就发表于 1956 年。

已经从边缘逐渐走向了文学研究的中心,受到研究者的尊重^①。布鲁姆(Lynn Bloom)和于宁(Yu Ning)在1994年进行了统计,“自70年代以来,学者们已经出版了250部以上以自传为主题的英文著作”。^②90年代以来,自传研究也逐渐成为世界性的课题,东西方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深入这一问题。2001年,马格丽塔·乔利(Margaretta Jolly)主编了两大卷的《传记百科全书:自传和他传的形式》^③,其中的辞条编写者多是传记研究的专家,这是对世界传记发展和研究的一个阶段性总结。上述自传研究角度多元,成果丰厚,且富有启发性,为本书的展开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本章将对最具相关性的研究理路进行梳理和评介,以为下文的论述提供参照。

不过,在这之前,有必要对本书所论的自传这一概念进行界定,以确定论述的界限。

自传研究虽然已经比较成熟,但对自传的定义仍然被公认为是最难的。早期,虽然约翰生博士也曾专门论述过自传,但他又警告说,对自传的定义是一种冒险的行为^④,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关于自传的定义,一般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自传一般指签订了“自传契约”的正式自传,以勒热讷为代表:

当某个人主要强调他的个人生活,尤其是他的个性的历史

① William C. Spengemann, *The Forms of Autobiography: Episodes in the History of a Literary Genre*,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xi. 这一现象得到了研究者的公认,如奥内就在他主编的那部自传研究经典论文集中,对研究历史和现状进行了梳理,而这部论文集的出版也是自传研究热的一个标志。

② Lynn Bloom, Yu Ning, "American Autobiography: The Changing Critical Canon", in Diane Bjorklund, *Interpreting the Self: Two Hundred Years of American Autobiography*, Chicago & London: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11.

③ Margaretta Jolly ed., *Encyclopedia of Life Writing: Autobiographical and Biographical Forms*, London: Fitzroy Dearborn Pub., 2001.

④ Robert Folkenflik, "Introduction: The Institution of Autobiography", in Robert Folkenflik ed., *The Culture of Autobiography: Constructions of Self-Representation*,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13.

时,我们把这个人用散文体写成的回顾性叙事称作自传。^①

他强调自传的传主个性、回顾性、散文体等因素,将其与小说、诗歌、书信、游记、日记、自画像、随笔等形式区分开来,突出了自传的典型性和独特性。许多自传研究者的理解与他的比较接近,如居斯塔夫就认为,作为一个文学文类,自传的独特性在于,“它从整体上重新组织并解释一个人的一生,基于这样的事实,它是自我认知的一种方式”。^②他强调“从整体上重新组织”,这与勒热讷的“回顾性叙事”是一致的,说明他偏重的是正式自传,不过他又提出了“解释”和“自我认知”特征,却触及了对自传的现代理解。英国自传的早期研究者马特乌斯(William Matthews)认为,除了“作者写自己的生活”这一标准外,自传应当包括生平的“重要部分”(significant part)^③,限制也较严格。艾布拉姆斯对自传的界定也是狭义的,“自传是传主写作的关于他/她本人的传记”。^④并将回忆录、日记、游记等形式与自传区别开来,以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卢梭的《忏悔录》、歌德的《诗与真》、富兰克林的《富兰克林自传》、亨利·亚当斯的《亨利·亚当斯的教育》等为自传的典范。

广义自传泛指一切形式的自我生平写作,除正式自传外,将自传体小说、自传诗、游记、回忆录、口述历史、自序等边缘自传,以及日记、书信、检查、履历等私人文献统统纳入研究的范畴。杨正润先生在他的新著《现代传记学》^⑤中就是这样一种区分和宽泛

① [法] 菲利浦·勒热讷:《自传契约》,杨国政译,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页。

② Georges Gusdorf, "Conditions and Limits of Autobiography", in James Olney ed., *Autobiography: Essays Theoretical and Critical*, p. 38.

③ William Matthews, *British Autobiographies: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British Autobiographies, Published or Written Before 1951*,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55, p. xi.

④ [美] 艾布拉姆斯:《文学术语汇编》(第七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年版,第22页。

⑤ 杨正润:《现代传记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另外必须说明的是,本书研究自传的视角和理论方法,都直接受益于杨老师的教诲,在此谨致谢意。

的定位。维尼特拉伯 (Karl Joachim Weintraub) 在分析自我概念的形成史的时候,使用的材料包括“书序、诗歌、书信、日记、回忆录,以及自传”^①,也是一种宽泛的用法。斯塔罗宾斯基 (Jean Starobinski) 对自传的基本定义是:“一种由本人写作的个人传记”,他承认“许多特殊的类型都可以出现”,自传是“个人的行为”^②,包括日记、游记、回忆录等,唯一的规则和要求就是“对一个人的忠实叙述”^③。波乔科兰德 (Diane Bjorklund) 就赞同很多学者的努力,即收集各类生平故事,包括日记、书信、游记和口述历史等作为自传加以研究^④。马格丽塔·乔利的《传记百科全书》也是将各种类型的自传包含在内,富有开放性和包容性。马库奇 (Michael Mascuch) 的理解更加宽泛,他把自传看作“一种活动”或“文化机制”,是普遍的自我表现活动,不仅包括各种文学文本,而且还可以包括“非文字的和无作者的”文本,如电影、照片、小件收藏、个人全部衣物,等等^⑤。可以看出,当代研究者更多地从广义的角度看待自传,把自传作为自我认识、自我表现和自我解释的直接方式。本书也正是在广义范畴使用自传这一概念的,包括正式自传、边缘自传和私人文献。

第一节 自传与自我意识

德国自传学者、当代自传研究奠基者乔治·米什 (George Misch) 在定义自传时,从自传的词源本身进行了分析,指出它是“由个体自

① Karl Joachim Weintraub, *The Value of the Individual: Self and Circumstance in Autobiography*,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8, p. xiv.

② Jean Starobinski, "The Style of Autobiography", trans. by Seymour Chatman, in James Olney ed., *Autobiography: Essays Theoretical and Critical*, p. 73.

③ Ibid., p. 74.

④ Diane Bjorklund, *Interpreting the Self: Two Hundred Years of American Autobiography*, p. 10.

⑤ Michael Mascuch, *Origins of the Individualist Self: Autobiography and Self-Identity in England, 1591-1791*, Cambridge: Policy Press, 1997, p. 18.

身 (auto) 对个人生活 (bios) 进行的描述 (graphia)”。^① 这是对自传一词的最直接认识。沃森 (Julia Watson) 认为, 对于这样一种“自我一生平—写作” (self-life-writing), 70 年代之前研究者主要关注的是“bios”即“生平”事件, 倾向于将自传看作传记的变形, 侧重历史性^②, 而这种“生平”所指的也是某个伟人的公开的、重大的事件, 自传记录伟人之所以取得伟大成就的过程, 是值得人们阅读并模仿的行为^③。而这种“伟人”实际上也就是欧洲的“白人、男性、有高等文化修养者”^④, 乔治·米什、居斯塔夫就持有这种比较狭隘的观点, 这当然和时代的限制有关。在 70 年代, 这种思想逐渐受到了质疑, 自传研究者开始关注诸如女性、有色人种、少数族裔等群体的自传, 自传研究逐渐走向开放和民主。勒热讷在《论自传》中呼吁: “自传是一种人权。成为你自己的生活的主人!”^⑤ 威廉姆·豪威尔斯 (William Dean Howells) 称自传是文学中“最民主的领域”, 波乔科兰德非常赞同, 认为自传研究涉及的人群、身份应当更加宽泛, 尤其是之前被排除和忽视的那部分人, 自传不再局限于“高雅文化”或名人、富人之中^⑥, 任何人的自传都是能够“迷人的”, 不管乍看起来

① Georg Misch, *A History of Autobiography in Antiquity*, trans. by E. W. Dickes, London: Routledge, 1950, p. 5.

② 现在自传研究从关注客观“生平”事件转变为“自我”、“写作”, 即起初强调这种生平应该是“一个人一生的过程”, 是“客观的历史描述”, 并且这一自我是毫无问题的, 不存在“身份、自我解释、自我存在, 或者自我欺骗”之类令人痛苦的问题, 将自传看作传记的分支, 而传记又被看作历史的一种, 如今则指向了“自我问题”, 即“对自我的发现、创造和模仿”, 而且“现在写作行为——自传的第三个要素——呈现了它真正的重要性”, 因为正是通过这一行为, 自我和个人的生平才“呈现一定的形式”。See James Olney, “Autobiography and the Cultural Moment: A Thematic, Historical, and Bibliographical Introduction”, in James Olney ed., *Autobiography: Essays Theoretical and Critical*, pp. 19-22.

③ Julia Watson, “Toward an Anti-Metaphysics of Autobiography”, in Robert Folkenflik ed., *The Culture of Autobiography: Constructions of Self-Representation*, p. 58.

④ Ibid.

⑤ Philippe Lejeune, On Autobiography, See, Michael Mascuch, *Origins of the Individualist Self: Autobiography and Self-Identity in England, 1591-1791*, p. 11.

⑥ Diane Bjorklund, *Interpreting the Self: Two Hundred Years of American Autobiography*, pp. 9-10.